

编者按：2014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过去35年，国际体系环境沧桑巨变，中美相互认知和关系调整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回顾建交以来的历史，不难发现，中美关系既曾面对过冲突对抗的危险时刻，也曾出现过密切合作的良好局面，双方在竞争与合作中历经35年风雨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中美高层就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广泛共识。展望未来，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下，中美能否降低战略互疑、增强战略互信？能否管控好分歧、提高合作水平？显然，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中美对彼此的战略定位和实践互动。值此中美建交35周年，本刊特别刊发三篇相关文章，以飨读者。

潮起潮涌 35 年

——中美关系的历史演进及其展望

□ 沈丁立 / 文

2014年是中美关系正常化35周年。35年前，在1978年年底，中美克服困难、决定建交，这一决定于1979年1月1日起生效。也是在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通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决定将国家发展的重点放到国民经济建设上来，通过包括国际合作的方式，来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同美国建交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配套战略。这项决策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外交战略进行的第一次重大调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对外合作的核心举措，对此后的中国外交和国家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推动中国的国际化和现代化进程起到了定向、催化和加速作用，迄今仍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未来的前行。

光阴荏苒。到2014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走完了三个半年代，中美两国也迎来了建交35周年。本文回顾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各个年代的国际背景，提出双边关系的核心特征和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并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向做出基本判断。

第一个十年（1979—1988年）： 改革开放、战略妥协

中美建交是在中国内外特定历史形势下发生的。对中国而言，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一严重内乱后，国民经济亟待振兴，国民人心思定。邓小平等中共第二代领导人复出后，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得出世界大战不会马上发生以及可以避免的战略明晰，进而将国家发展引上了经济建设的方向。在终结了延续十多年的“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后，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轨道。

同时，中国将“独立自主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发展方略调整到全方位的经济开放合作，不再强调凡事独立自主，而是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同各种有利于增进中国生产力进步的生产要素进行合作，执行了一条引进外资、技术与管理、促进外向型出口的贸易立国政策。中美结束长期以来的全面敌对状态，使中国得以更为安全地推进发展战略。中美建交以来，双方在经贸和其他领域的大规模交流合作，催化并从整体上保障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稳步前进。

中美关系正常化曾面临诸多困难，其核心障碍在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关切。中美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差异悬殊，但双方采取了接触加合作的政策，在安全领域共同合作，防范并牵制由于苏联扩张所形成的威胁。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在这个阶段先后以两国建交公报以及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为准绳，中国反对并限制美国在与中国建交后继续对台售武。在双边人员与经济往来上，中美双方取得了巨大突破。正是在此基础上，迄今中国争取到了和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35年。

中美关系正常化给中国带来了重大战略利益，即改善了中国当时面临的外部安全处境，提供了中国进行经济体制变革的发展动力和合作资源，为中国现代化制度变迁创造了外部环境，从而增进了中国的和平进步，提高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从最初的经济变革不可阻挡地走向了国家体制现代化的全面强盛之路。在中美建交最初十年中，中国开始吸引来自境外的投资，在制造业与科教等领域开始了国际合作。中美



中美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在卡特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图为1979年1月29日，邓小平（左）在美国华盛顿肯尼迪中心观看表演时与卡特总统一起向观众致意。

建交也推动了西方一批国家承认中国，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中美建交并没有解决诸多历史难题，北京和华盛顿未就美国停止对台售武达成一致。在中美建交后，美国国会迅即制定《与台湾关系法》，对华进行牵制。在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中美分歧重大，留下了悬而未决的严重障碍。客观上，只要中国国家统一这一核心利益继续受到美国武力干扰，就不能认定中美关系已经完全正常化。所谓的“正常化”，只是相较于在两国缺乏正式外交关系并处于严重对抗的时代。在严格意义上讲，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个过程，它还有待真正完成。从历史角度看，上述严重问题的存留反映了中美两国当时的力量对比以及双方对安全合作的迫切需求，反映了中美双方国家安全和外交理念中的现实主义。在当时各自面临的内外形势下，中美能够成功建交，双方进行妥协，是两国在维护彼此利益的共同诉求下较为务实的选择。

第二个十年（1989—1998年）： 韬光养晦、调整关系

在中美建交以来的第一个十年中，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以美欧为主要借鉴对象。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运作中，中国也注意向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经验学习，包括学习和借鉴美国在市场 and 法制建设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中美因此启动了大量的交往与合作，这一阶段的中后期，中美两国的关系总体是平衡的。

但是，中美关系在1989年春夏遭遇寒流，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内部事务进行干涉，并对中国实施制裁，中美官方往来几近停滞。风云转换之际，中国提出“韬光养晦，冷静观察”的指导方针，巩固周边外交，改善大国关系，坚持改革开放，不久打开局面。1991年和1992年，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和明仁天皇先后访华，中国外交渐趋活跃，中美官方交往也逐步走出低谷。

1993年，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中美两国元首举行正式会晤。双方确认彼此对确保世界和平的重大责任，美方认识到中国在世界上的重要作用，希望中美关系得到改善；中方提出用长远观点来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这次会晤恢复了中美领导人的峰会机制，但双方合作仍存四大障碍。首先，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分歧严重。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提升对台售武规格，违背相关承诺。其次，在人权问题上，美国屡屡威胁将此与双方经贸挂钩。第三，美国就双边贸易不平衡向中国施压，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等问题上发难。第四，美国在防扩散问题上对华一再制裁，然而自己却向台湾输出先进常规装备。

对上述问题，中美两国采取了分类管理的务实办法。本着有效管理并解决问题的宗旨，中美逐步建立起各种专业性的谈判和协商机制，从20世纪90年代起展开全方位对话，使双边关系在所有这些领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在整体关系上，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允许台湾领导人访美给中美关系带来的严重冲击后，两国重申双边关系，一度确定了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华盛顿再度确认对华接触政策，双方元首于1997年和1998年分别对对方进行了国事访问，缓和了冷战结束以来的中美关系。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渐趋认识到极端“台独”对自身的危害，从而扩大了同中国大陆在此问题上的合作。在人权问题上，克林顿政府逐步感知到将中美经贸关系与人权问题挂钩无助于实现目标，于是主动扭转了政策。随着双方接受“分类处理分歧”，中美

更多采取了对话，人权不再成为讨论禁区，这为中国在新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创造了有利条件。在防扩散和地区安全层面，中美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着力调整政策，美国从单向制裁转为寻求有效合作，双方就出口管制达成诸多共识，平衡了彼此的经济与安全利益。中美在防扩散方面的良性互动，在新世纪又延伸到关于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中美还在伊核问题上开展协作，最近取得了积极成果。

在这一阶段，中美关系步入了冷战后时期，双方在冷战期间形成的结构性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时代巨变促使中美对自身和彼此重新定位，审视国家利益发生的变动并思考双边关系再稳定的新模式。这期间中美关系出现过重大波动，在台湾与人权等问题上全面较量，这也迫使两国战略精英思考中美关系与人类的和谐进步，为新世纪理性博弈做出了铺垫。

第三个十年（1999—2008 年）： 抓住机遇、扩大共赢

中美关系在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的一段较短的稳定期后，在 1999 年再次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严重损害，并在新世纪初面临由于美国军机抵近侦察而导致两国军机相撞的严重事件。尽管这些冲突性质严重，但中美双方仍然实现了有效的危机管控，维护了两国关系的整体持续发展。

这十年中，两国关系出现了一系列新特征。一方面，由于成功地管理了对外关系，所以中国获得了集中精力发展和开放的重要机遇。这期间中国经济取得强劲发展，中国快速从地区大国迈向世界大国，并逐渐呈现出世界强国的一些特征。与此相随，中

美各自的国内政治议程也开始更多地影响双边关系。另一方面，在长期困扰中美关系的台湾问题上，一段时期以来不断加剧的“台独”事态也更多促使中美为维护台海现状而采取合作。自 2002 年以来，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多次表示“不支持”甚至“反对”“台独”，白宫反复强调维持台海两岸现状的重要性。

在这个阶段，中美安全合作的核心是共同反恐。2001 年 9 月 11 日发生的严重打击美国的国际恐怖事件，不仅对美国本土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袭击，而且对美国应对危机的能力提出了重大考验。小布什政府因此宣布美国进入战争状态，并对外发动了两场战争，出现明显失当，铸成更为严重的危机，迄今尚未完全收场。美国反恐需要国际合作，国际恐怖主义迅速上升为美国的头号威胁，中美在国际反恐中开展合作，提升了双方信任。中美快速走出两国军机相撞形成的僵局，并在小布什执政的多数时候，形成了较长时间的稳定局面，中国预言并实现了“重大战略机遇”。在此期间，中美在防扩散、地区稳定、开放市场等基本方面都保持了合作态势。

在此阶段，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推进，中国从实现初步小康，开始走向全面小康。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提出的在新世纪前 20 年实现国民经济与人均 GDP 都翻两番的目标，均在 2008 年即提前 12 年完成。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中美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差距显著缩小。美国国内出现了更多关于重估中美汇率以调整双方投资与贸易关系的呼声，虽然这给两国经济关系平添压力，但也促使双方寻找新方式以策互利协作。在小布什时代，“中美战略（高级）对话”和“中

美战略经济对话”应运而生，这又被提升至奥巴马时代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些新的高层对话平台，有利于阐发中美各自的发展观，纾解并利用各自内外压力，整合两国的行政资源，经由妥协促进经济共赢。

一度严重干扰中美关系的台湾问题，在经过十多年的起伏之后，在中美迎来建交 30 周年前夕开始降温。一方面，在新世纪的前十年，美国先后面临国际恐怖主义的严重打击和严重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国力受到重创，这就牵制了美国力量的全球投放，迫使其在非核心安全领域进行收缩，包括在台海问题上部分调整政策。同时，鉴于中美经贸关系已经高度依存，在美国严峻的金融危机面前，中美已经没有“去耦合”的选择，只能同舟共济。另一方面，中国崛起正在深刻地重塑中美关系，使之更为平等和积极，并影响着美国对台海两岸的政策朝着更加务实的方向调整。大陆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以及因此取得的自信与塑造力，也在正面推动两岸关系远离颠簸。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发展更为成熟的双边关系，也就出现了更多机会。

当前十年（2009—2018 年）： 战略崛起、共稳世界

2008 年中国 GDP 为 4.3 万亿美元。从 2009 年起，中国进入战略崛起的快通道。这一年，中国 GDP 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2010 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2012 年，中国 GDP 超 8.2 万亿美元，在 4 万亿美元这一 2020 年全面小康期待值的基础上翻了一番。2013 年，中国 GDP 达到 9.2 万亿美元，这恐怕是 2000 年所能期待的 2030 年之后的发展水平。中国所展望的在本世纪中



2014年3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三届核安全峰会时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

叶全面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有望提前20年实现。

进入中美建交以来的第四个十年后，中美面临的外部环境都有很大变化。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已经结束伊拉克战争，并将结束阿富汗战争，美国大规模的反恐战争将告一段落。另一方面，美国战略精英也已敏锐感到以国家行为体为单位的传统国际竞争将重返国际关系主流，而且美国“一超多强”的局面将被中国崛起的新格局所打破，人类将从此进入美中两强并存的新时代。

在这个阶段，中美互疑在增强。中国对美国的疑虑是美国在中日关系上对日本更多的倾斜。美国在1972年将冲绳归还日本时，刻意将中国钓鱼岛的行政管理权给予日本，并在美国“重返亚太”的框架下强调《美日安保条约》对这一区域适用，这对中国主权构成了严重侵犯，并且助长了日本右翼保守主义势力。中国对美国在台湾、西藏、南海问题等领域对中国权益的干涉，具有强烈的戒心。

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在大气空间、太空、海洋、网络空间的进入也日益感到不安，其对中国的制约与侵犯则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对美国的猜疑与不满。

既有大国与崛起大国的这种互疑，本身并不奇怪。但这些猜疑以及因此引起的可能对抗如不得到及时诠释与解决，则有可能引起双方关系的恶性循环。因此，中美及时对话，尤其在最高层间进行沟通，具有重要的增信释疑作用。2009年奥巴马总统上任后，于当年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双方不仅确认继续推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而且推出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包括中美互派留学生的“十万强计划”。2013年，在中美新一届领导人产生后，双方元首不拘形式，在美国洛杉矶举行非正式会谈，力图缓和与稳定双边关系。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勉力实现两国“政治互信、经济互利、文化互鉴”的理想。

中国崛起的直接后果已经并将继

续给现有国际体制带来深刻影响。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力量的成长将有望改写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西方长期主导的国际秩序将开始进入东西方力量对比更为均衡的新国际体系。在当前十年，中美力量的差距还将继续缩小。随着中美合作的发展，中美竞争的局面也将可能扩大。在2020—2030年之前，世界有望逐步看到这样的变化，即一个稳健的中国以成熟的步伐，在现有国际法框架内和平地达到彼岸；而一个成熟的美国，对一个遵守了基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制定的国际法体系并和平崛起的新的世界级大国，有相当的思想准备予以接受，或不得不予以接受。回顾中美建交35年来的历史，可以得出结论，中美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是以讲规制并且是以和平方式发生的。这也应该是未来中美和平博弈、互利共赢的理想途径。■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副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张凯）